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1.001

# 权威辞书对语言文字规范的贯彻与引领

——以《新华字典》为例

张 书 岩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汉字与汉语拼音研究室,北京 100010)

**摘 要:**辞书是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规范型语文辞书跟语言文字规范密切相关。《新华字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部字典。《新华字典》和语言文字规范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在“贯彻规范”和“引领规范”两个方面。它对语言文字规范的贯彻、阐释是全方位的,涵盖了字形、字音、字序与检索、收字量等各个方面。它对规范的引领作用体现为发现规范的不足,做出变通处理,成为规范修订的参考,或者直接确立规范。

**关键词:**辞书;《新华字典》;语言文字规范

**中图分类号:**H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1-0001-08

在当代语言生活中,语言文字规范极为重要,而语言文字规范从制定到贯彻推行乃至修订,又始终和语文辞书密切相关。《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部字典,因此,本文拟以这部字典为例,说明规范型语文辞书对贯彻和引领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作用,以使全社会更加重视辞书,更好地学习、利用辞书,让辞书在贯彻语言文字规范、促进语言文字生活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一、制定语言文字规范的目的和辞书的任务

### (一)为什么要制定语言文字规范

语言是人类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交际工具,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字,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全社会认可并共同使用。但是,由于社会成员众多、地域广阔、时间久远等多种因素的存在,语言文字在使用中的歧异是不可避免的,而歧异必然会使社会的语言交际发生障碍。为了社会交际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语言文字规范。这些规范

一般由权威部门制定,国家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部门发布实施。规范一旦实施,歧异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制定规范是保障社会交际顺利、畅通的客观需要。

### (二)语文辞书的任务

辞书是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专科辞典等工具书的统称,其中最常用的是语文辞书。语文辞书包括字典和词典。字典以字为单位,按一定次序排列,每个字标注读音,解释意义和用法;词典则收集一定数量的词汇,按一定次序排列,每个词标注读音,解释意义和用法。语文辞书通过方便的查询方式,为语言文字的使用者提供字词正确的形音义,从而为社会成员的语言交际提供服务。

语文辞书的收字、收词、注音、释义,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来源于社会的语言实践,它不仅忠实地记录语言,而且面对语言使用中的歧异现象,会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加以选择,因此往往具有“准规范”的性质。例如我国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就是从探究文字的本义入手,对当时使用的汉字进行系统梳理,收入 9353 个小篆字形和 1163 个“重文”,又首创 540 部首,把 9353 个汉字按照意义进行分类,归到各部之下,正文则按义、形、音的顺序进行说解。

收稿日期:2022-09-28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2019 年度重点项目“规范化权威字典与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ZD1135-90)

作者简介:张书岩(1946—),女,山东无棣人,文学硕士,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与汉语拼音研究室研究员。

《说文》为学习汉字树立了规范。又如隋唐时期为满足应试需要,有人编纂了一些辨析正俗、推行正字的字书,像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将所收字分为俗、通、正三体,具有很强的规范性质。明代梅膺祚编纂《字汇》采用的214部首,不仅为清代的《康熙字典》所沿用,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至今仍在使用。214部首同时成为我们今天制定国家标准《汉字部首表》的重要依据。

### (三) 语文辞书的分类

语文辞书从内容、时代、规模等各个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分类。而从辞书与规范密切程度的角度,可将辞书分为两大类:查检型语文辞书和规范型语文辞书。前者或旨在全面、客观地反映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为读者全方位解释字词的形音义及其源流,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或旨在反映某一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字词的特定音义,如《古代汉语词典》《方言大词典》。后者则重在当代,旨在诠释规范,因此在解释字词的形音义之时,须力图与当时的规范保持一致,保证读者在教学、写作、编辑等使用语言文字的场合不违背规范,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虽然两类辞书的根本任务都是为读者提供字、词的查检服务,但由于规范型语文辞书是直接为贯彻语言文字规范服务的,所以我们选择它来讨论辞书与规范的关系。为避免烦琐,以下行文中的“规范型语文辞书”省略为“辞书”。

## 二、规范型语文辞书的代表《新华字典》

本文以《新华字典》为例说明规范型语文辞书和语言文字规范的关系,原因有以下四点。

### (一) 编写《新华字典》是政府行为

辞书发展的历史证明,思想文化的变革会促进辞书的变革,一个力图有所作为的政府也往往会重视辞书的编纂。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会带来语言特别是词汇的变化,而这些需要辞书来记录,并反哺它的受众。例如,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命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初贾里书师将以上三篇合为《仓颉篇》,共55章,3300字,又称“三苍”(当然这只是字表,还不是真正的辞书,但可作编纂字书的基础),作为民众学习汉字的依据。许慎编写《说文解字》,历时22年,成书后让其子许

冲将稿奉献皇帝,这一做法一方面说明此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它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清朝康熙皇帝命人编写了中国现存第一部官修的字书,并首次使用了“字典”的名称。“字典”一词起初专指《康熙字典》,后来才成为一切字书的统称。“典”者,标准、规范也。“字典”一词的使用,使辞书的规范作用得到了升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当时西方的科学知识、先进的思想文化如潮流般涌入中国,也带来了语言文字的重大变革。为反映这种变革,《中华大字典》和《国语词典》应运而生。特别是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词典》,在注音方式、编排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事物、新词语、普及文化的新需求都使得原有的辞书捉襟见肘,编纂新时代的辞书势在必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将编纂新型辞书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的叶圣陶先生首倡编写《新华字典》。我们国家在编审局设立了一个编纂辞书的直属机构——新华辞书社,并立即着手组织字典的编写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遵照国务院指示承担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任务,组建了词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随之并入词典编辑室,这些自上而下的有力措施说明了国家对《新华字典》的重视。

20世纪70年代,由于“文革”干扰,《新华字典》出版发行受到影响,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参与了《新华字典》1971年版的修订工作。他亲自确定修订原则,两次接见修订组代表。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华字典》修订者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把最初的400多处修改意见压缩到了64处<sup>[1]</sup>。

### (二) 业务过硬的编写人员

一部辞书能否保证较高的质量,编写班子至关重要。前述《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国语词典》等辞书,编纂者都是学术大家。而《新华字典》之所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正是因为它的编写班子是高水平的。

主持《新华字典》编纂、修订工作的都是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叶圣陶先生亲自确立《新华字典》的选题,亲自安排主编,挑选编写人员,制订编写体例,确定学术顾问和审读专家人

选,并承担了字典的终审工作。《新华字典》第一版的主编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吕叔湘先生担任第一版的首席学术顾问,丁声树和李荣曾主持、参与字典的修订工作,王力、邵荃麟、陈原、金克木、周祖谟等语言学大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参与过字典的编写工作。自《新华字典》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词典编辑室以来,一直由资深的语言文字学、词典学专家负责修订工作,保障了《新华字典》能够与时俱进。

### (三)实用性、简明性、规范性的风格特点

旧时代的辞书,编写者多为封建文人,因此他们不大会考虑一般民众能否接受。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进步的文人有了民众意识,但身处变革的过程之中,一时还难以完全摆脱旧的窠臼。而《新华字典》有所不同。它的编写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适合新时期读者的需要,让他们利用这部字典,尽快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这就要求字典具备实用性、简明性、规范性的特点。因此,它一改旧辞书全用文言的体例,字、词注释和例句全部使用白话,在注音和编排方式上也进行了革新,以方便群众使用<sup>[2]</sup>。《新华字典》第一版“凡例”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该字典的编撰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这种一切为大众、一切为语言规范化服务的编写宗旨,注定使这部字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四)国内外巨大的影响力

《新华字典》用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在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新华字典》是扫盲班学员必备的工具书,借助字典,学员识字的效率大大提高,而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新华字典》在巩固脱盲成果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有这样的结果,《新华字典》功不可没<sup>[3]</sup>。

《新华字典》在国际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日本学者曾翻译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欧美、东南亚一些国家相继引进原版《新华字典》,我国

学者还编写了双语的《新华字典》。1972年周恩来总理将《新华字典》作为国礼回赠给圣马力诺共和国的一位来访政要。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访美时把《新华字典》第10版赠送给美国耶鲁大学。2011年7月5日,第11版《新华字典》首次实现全球同步上市<sup>[4]</sup>。

《新华字典》的发行量,创下世界辞书之最,迄今为止已印行6亿余册。几十年来,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等奖项。2016年4月12日,吉尼斯世界纪录机构在伦敦宣布,《新华字典》获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sup>[5]</sup>。

综上所述,《新华字典》作为规范型语文辞书的代表,确实是实至名归。

## 三、贯彻规范,引领规范

### (一)全面贯彻规范、阐释规范,使规范显性化

当一项语言文字规范颁布之后,除了与规范关系密切者,广大语言文字使用者未必能及时了解和领会;而且规范只是一些条文,人们一时还难以完全理解和掌握。人们真正理解并正确执行规范大多是通过辞书实现的。晁继周先生说:“借助词典这个重要载体,语文规范标准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才能在亿万群众的语文实践中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sup>[6]282</sup>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布的各项语言文字规范,如《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下除引文外,后三个规范分别简称《一异表》《字形表》《审音表》)等,都是通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得以贯彻执行的。再举一例,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字表》发布后,商务印书馆专门出版了由研制者编写的《通用规范汉字字典》,通过对字头的处理、汉字的注音、释义和附加说明等,使《通用规范汉字字表》内容得以细化,方便了广大群众对规范的理解掌握。

《新华字典》对语言文字规范的贯彻、阐释是全方位的。以下从字形、字音、字序与检索、收字量四方面阐述。

#### 1. 字形

人们借助汉字的字形读懂书籍、文章。因此,在有关汉字的规范中,字形规范具有最重要的地



位,我国政府也把制定字形规范放在首位,而规范一经发布,《新华字典》立即予以全面地贯彻落实。

1953年版和1954年版《新华字典》出版时,汉字简化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字典的字头和正文还采用繁体字系统。1955年11月和1956年1月国家先后公布了《一异表》和《汉字简化方案》,1957年6月商务新一版《新华字典》便以《简化字方案》中第一表和第二表的简化字作为主体字头,把原来作为主体字头的繁体字加括号附列在主体字头的右侧。对于《一异表》中被淘汰的异体字和一些表外异体字,也做了同样处理。从1998年第9版开始,表内异体字在左上角标注\*,表外异体字在左上角标注\*\*。

1964年3月和1965年1月国家先后公布了《简化字总表》和《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修订重排本,其字头一律改用符合《字形表》字形要求的大号宋体字,而且在1962年本的基础上,根据《简化字总表》的规定,把能够类推简化的字,都加以类推简化,除附列字头外,主体字头和正文全部使用了规范的简化字。

其后公布的规范标准,凡涉及字形的,《新华字典》都及时跟进、及时调整。如1977年国家公布《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表》,1980年出版的《新华字典》1979年修订重排本就修改了相关内容。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对个别字有所调整,1990年版就调整了有关字头,修改了相关内容。1988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发布,1992年版又对个别字头作了调整<sup>[7]</sup>。2001年12月《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发布,2004年版又对全书所涉及的异形词做了处理。

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以下简称《字表》)发布,发布前,《新华字典》第11版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为了使即将出版的第11版能够紧跟规范,修订者根据《字表》报批稿对《一异表》的调整,在字形处理上作了变动,将数十个异体字在全部或部分意义上调整为规范字。处理结果与后来发布的《字表》基本一致,个别不一致之处在第12版又作调整,使处理结果与《字表》保持完全一致。

《新华字典》在字形的规范上不断完善。在第10版以前,没有将全部被类推简化的繁体字附列在简化字字头之后,为了使读者全面认识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对应关系,从第11版开始,采用了全部繁体字均附列在简化字之后的做法,这样,第

11版《新华字典》的字头新增了1500多个繁体字,进一步方便了读者查找引用。

## 2. 字音

初版《新华字典》编写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制订,每个字的读音基本依据1932年编制的《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用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注音,按照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字头。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新华字典》立刻跟进,从1959年版开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注音和排列字头。

《新华字典》通过修订及时贯彻了国家制订的《审音表》的有关规定。1957年10月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1958年重印本据此对原有注音做了某些修正。例如,对有异读的“庇”字原注bì和pì两读,重印本改为只注bì一种统读音。1959年7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续)》、1962年12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第三编》发表后,《新华字典》都及时在新版本中做了修订。1985年12月,《审音表》在对“初稿”做某些修订后正式发布,1990年《新华字典》重排本据此又改订了字音,例如,“厕”字原注有cè(厕所)和sì(茅厕)两种读音,该版改为只注统读音cè<sup>[7]</sup>。

2006年1月民政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下文批复福建省民政厅、教育厅和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意将福建省冠豸山的山名读音定为“Guànzài Shān”,这一读音由《新华字典》第11版首次正式收录。

《新华字典》还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增加新的音项。如“匱”字有kuì、guì两个读音,第11版之前仅收kuì音,下注:“〈古〉又同‘柜’(guì)。”因现在经常提及的古代医书《金匱要略》和中药名“金匱肾气丸”中的“匱”就是“柜”的意思,应读guì,所以第12版增补了“匱 guì”的字头和释文,以方便读者查检,防止误读<sup>[8]</sup>。

## 3. 字序与检索

字头的排列方式和检索方法,和读者使用字典是否方便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新华字典》也一直紧跟规范的汉字排序原则和检索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使用。

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新华字典》按音序编排正文的两个版本(1953年版和1957年版)都是依据注音字母的排列顺序,从1959年版起,各个按音序编排正文的版本均采用了汉语拼

音的排列顺序<sup>[7]</sup>。

1965年发布的《字形表》规定了6196个汉字的笔画、笔顺,并确定了同笔画的汉字按横、竖、撇、点、折的先后顺序排列。1988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沿用了《字形表》的排序,其后又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加以明确。《新华字典》首先在《部首检字表》和《难检字表》中落实了这一排序规范,从1979年版起,将最初几个版本点、横、竖、撇、折的排列顺序改为横、竖、撇、点、折的排列顺序。1998年出版的修订本,在字序排列上(包括正文和检字表)也根据规范标准做了相应的调整<sup>[7]</sup>。

1999年10月国家语委发布的《GB13000.1 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给出了“汉字字序定序规则”,解决了同笔画笔顺的字如何排列的问题(例如“干于”“土土”“𠂇旭”“目且”“口口”“己巳巳弓”的排序)。依据这一规范,2004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第10版不仅调整了检字表和正文的排序,而且将笔画笔顺和字序的规范全面落实,适当调整了部分词序。如:“塔”字下收列了[塔塔尔族]和[塔吉克族]两个复音词条,按照汉语拼音的排列顺序,把[塔吉克族]调到了[塔塔尔族]之前<sup>[8]</sup>。

在使用部首检字法时,立部方面,1965至1998年各版《新华字典》,采用的是189部的部首表。在第10版修订中,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编制的《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重新编制了《部首检字表》,把189部改为201部。2009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标《汉字部首表》(对“草案”有所调整,仍为201部),这一标准在2011年的第11版中得到完全落实。

在归部方面,传统字书以“据义归部”为主。这种归部方法有其优点,但由于字形、字义演变等原因,很难贯彻到底,也很难取得一致的归部结果。《新华字典》没有因袭《康熙字典》等传统字书的归部方法,在处理某些字的归部时,贯彻了据形归部的原则。2009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基本上以据形归部为原则制定的《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以下简称《归部规范》),2011年的第11版便遵照这一规范重新编制了《部首检字表》。

#### 4. 字量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广大群众文化水平逐步提高,《新华字典》也通过及时修订,不断

增大收字量,以满足不同时期群众文化水平的实际需求。《新华字典》1953年版收单字6840个,1954年版总计收字7300余个(增收单字600多个),1957年、1959年版收单字8000多个,1971年版收单字8500左右(以上均含异体字)。1979年、1990年、1992年版均收单字11100个,1998年版、2004年第10版收单字10000多个(以上均含繁体字和异体字)。

2011年的《新华字典》第11版根据《通用规范汉字表(报批稿)》,新增正体字800多个,增收繁体字1500多个(详见(1)字形),异体字500多个,使单字总数达到13000多个。2004年和2006年国家先后公布了“鱣(𩚰)”和“𠂇(𠂇)”两个元素用字,字典第10版没来得及收在正文中,第11版把这两个字收进了正字头。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正式发布,第12版又增补了未收字“葯”和新获批的字表以外规范字“𠂇”“𠂇”“𠂇”等5个字。

#### (二)《新华字典》是如何引领规范的

辞书之于规范,一方面是遵守,另一方面又并非不折不扣地照搬。规范的目的是为保障语言生活的健康,而非束缚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是丰富的多变的,规范也应随着语言生活的变化不断完善、修订。规范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辞书在引领规范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晁继周先生说:“当某些规范标准与人民群众活的语言发生对立的时候,当现实语言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规范标准不能解决的时候,规范型词典应该提出解决的办法,而不应该视而不见,漠然置之。”<sup>[6]285</sup>例如《审音表》中规定的“统读”往往过于宽泛,不完全符合当代口语的实际读音或与古代某些词的读音有矛盾,《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就做了变通处理。如《审音表》规定“作,统读 zuò”,但人们读“作料”一词一般不读 zuò · liào,而读 zuó · liào,于是《现代汉语词典》在 zuò · liào 的读音后括注“口语中多读 zuó · liào”。辞书正是通过这些对规范的变通、补充和完善,成为规范修订的依据,如《通用规范汉字表》使一批原来的异体字获得了正字的地位,正是对辞书变通处理的认可。下面,让我们来看《新华字典》是如何引领规范的。

1. 发现规范的不足,做出变通处理,成为规范修订的参考

《一异表》所收的异体字与正字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但规范本身并没有说明,而且有些

字组显然处理不当。对此,《新华字典》对不同情况做了相应的变通处理。对于异体字意义少于正字的,在异体字左上角标注对应的义项号。异体字有正字以外的意义的,从1962年版开始另立字头,同时附列在正字后的异体字左上角添加了△的标志。例如“脩”是“修”的异体字,但“脩”另有“束脩”的意义,这是“修”字所不具备的,这种情况字典表示如下:修(△\*\*脩)xiū(释义)……“脩”则另立字头。这样,简化字与繁体字、正字与异体字的关系和使用情况就一目了然了。而个别根本不属于异体字的,则单立字头,不作为异体字附列。这些做法,大都为后来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吸收。

《新华字典》对异体字的变通处理,有不少成为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依据。以距离《字表》制定最近的第10版为例,在异体字的处理上与《字表》对异体字的修订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字表》将“皙”“瞋”“嘸”“蹻”“漂”“勳”6字调整为无条件的规范字,不再作为“晰”“瞋”“撇”“趟”“栗”“戮”的异体字。第10版将“皙”与“晰”完全分开;“瞋”在作异体字之外,另立字头;“嘸”处理为部分异体字,并加注:“‘嘸’只用于‘嘸嘴’。”实际上已将“嘸”“撇”二字的功能分开;“蹻”仅在 tāng 音下与“趟”对应;“漂”字未收;仅“戮(勳)”字一组与《一异表》全同。

②《字表》将39个异体字在特定用法上调整为规范字。第10版将其中的“絜”在 xié 音下独立字头,加注:“〈古〉又同‘洁’(jié)。”“袷”“仝”“綰”“脩”“𡗗”“絜”“吒”7字在作异体字之外,又另立了字头。“堃”“森”“喆”3字分别加注:“‘堃’多用于人名。”“‘森’多用于人名。”“‘喆’多用于人名。”另外“藁”字未收,说明字典并不认可“藁”是“绿”的异体字。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第10版的这12字与《字表》调整的39字相比,只占近三分之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要冒被指责为“不合规范”的风险的。

③《字表》将“撚”“掇”“揆”“𢶏”“嫫”“駮”6个无法和原正字构成异体关系的罕用字从异体字栏中删除。第10版“撚”“掇”“駮”3字未作“拈”“挪”“挨”的异体字处理(其中“撚”处理为“捻”的异体字),均另立字头。“掇”“𢶏”“嫫”3字未收,说明字典也不认可它们是“挪”“趟”“婀”的异体字。第10版对此6字的处理与《字

表》基本一致。

《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新华字典》第12版在异体字的处理上仍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例如《字表》规定“絜”(jié)为“洁”的异体,可用于姓氏人名,并未规定“絜”(xié)的独立音义,第12版根据需要,保留了“絜”(xié)的“量度”义。又《字表》规定“藁”为“绿”的异体,可用于姓氏人名、地名,而第12版仍未将“藁”处理为“绿”的异体字。这是因为《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已将“藁豆”作为“绿豆”的异形词收入,如再列“绿(藁)”的字头,显然有矛盾。不列出这组异体字,就避免了矛盾。“藁”字既是《字表》规定的异体字,又出现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显然不太合适,第12版对“藁”字的处理,实际上提出了各个规范尚需进一步统一、完善的任务。

又如在第10版修订中,《新华字典》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编制的《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以下简称《部首草案》)重新编制了《部首检字表》,把旧有的189部改为201部。但是,字典修订者没有机械地完全照搬《部首草案》,而是依据已有的成熟的相关规范和实际需要,做了较大改进。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部首草案》贯彻“丿”归折笔的原则,与《字形表》以及国家语委1999年发布的《GB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GB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相左,字典修订者依据上述标准,贯彻“丿”归竖笔的原则,对部首的排序做了较大调整。例如将“寸”部调到“升”部之前,“牙”部调到“戈”部之前。

②依据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1997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折笔的主部首由“乙”改为“乚”,“乙”调为附形部首。

③从实际需要出发,增加了部分附形部首。例如《部首草案》的主部首“己”部没有附形部首“巳”“已”,为了体现形近字的细微差异,《新华字典》从采用189部首法时便增加附形部首“巳”,第10版采用201部首法时保留了附形部首“巳”。又如《部首草案》的主部首“日”部有附形部首“曰”,但没有“𠂔”,这样从“𠂔”的“冒”就无从归部,所以第10版增加了附形部首“𠂔”。

上述对《部首草案》的变通处理,都被2009年公布的国家标准《汉字部首表》所采用<sup>[9]</sup>。

## 2. 直接确立规范

汉字的某些属性,是不宜由政府部门直接确



立规范的,如字义和某些读音的确定、某些词的写法等。此时,辞书的作用就凸显出来。《新华字典》在确立规范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 ①单字新义的确定

为了反映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语言中的新词新义不断产生。新词新义从开始出现到获得社会认可,取得合法地位,会有一个过程。而促使过程终结的任务,就会落在词典、字典的身上。当人们疑惑于一个词是否成立,一个字有没有某项意义时,就会说:“查查词典(字典)收没收?”这说明,词典、字典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规范与标准。新词的确定往往由词典完成,而一个字新义的确定往往由字典完成。在新义的确定方面,《新华字典》功不可没。

每确定一个字的新义是否成立,《新华字典》的编纂者和修订者都会做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际考察工作。经过这些工作,汉字的一个个新义进入字典,成为人们使用的规范。

例如:“火”字表示“兴隆”义的用法(如“买卖很火”)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后,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口语当中经常可以听到。于是1998年修订本在“火”字下增补了“兴隆”的义项及其用例。“秀”的“表演、展示”义。20世纪末,出现了“作秀、服装秀、灯光秀”等含语素“秀”的词,其中的“秀”跟该字原有的意义毫无关系,它本是英语 show 的音译,被借用来表示“表演、展示”的意思。这一用法持续稳定,构词能力较强,因此在第11版修订时为“秀”字新增了“表演、展示”的义项。近年来出现了“房奴、车奴”等词语,“奴”是个比喻的说法,第11版在原有的义项后新增了一个比喻义:“为了支付贷款等而不得不拼命工作的人。”这几年,“打卡”一词使用广泛,第12版“打①”后就增加了新词[打卡]。

### ②增补、确定读音

在语言生活中,有时会遇到难以确定读音的字、词,为解决这些难题,《新华字典》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癌”字的注音,根据普通话读音规律,本注为 yán,与“炎”字同音。这就导致病名“胃炎—胃癌”“肝炎—肝癌”等成了同音词。1961年,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丁声树先生曾就“癌”的读音问题请教过医护人员,他们反映,两字同音给医疗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因此,丁先生在主持修订《新华字典》时,参考吴语中“癌”的读音,将“癌”的注音从 yán 改为“ái(旧读 yán)”<sup>[10]</sup>。

作为规范的各种字表,往往只有一个个的字,这些字的读音和意义是什么,该如何使用,并没有说明。为落实字表,辞书必须把这些字的形、音、义都告诉读者,这就是一个确立规范的过程。突出的例子就是为地名用字确定读音。地名,往往承载着历史、民族、地理、方言等各方面的信息,有时其用字于辞书无据,有时辞书虽有其字,但读音、意义却不一定与地名用字相同。各地提交给民政部门的地名用字往往没有注音,为它们确定读音的任务便由语言学、词典学专家来完成。在这方面,《新华字典》的贡献不可忽视。从第11版开始,修订者针对读音不明的地名用字,查阅了各种地名辞典、各省地图,找到具体地名后,设法向当地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咨询读音。如果确认不了,就亲赴当地考察,得到当地读音后,再按照语音规律,把方言读音转化为普通话读音,最终确定这些字做地名时的普通话读音。例如:甘肃积石山县乜藏镇中“乜”的读音。《汉语大词典》“乜”注音 qié,释义为“宋代以来西北少数民族地名用字”和“少数民族姓氏用字”。今天的地名该读什么,没有注明。经实地调查,在第11版中确定读 bié。再如,“梛”是作为科技和地名专用字收入《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第11版已收录了该字的 pō 音(楸梛,植物名),但在地名中的读音不明。为此修订者专门调研了“梛”字用于地名的情况,在第12版为“梛”字增补了 bō 音及地名义。又如,“鰐”字的读音,通行辞书大都注 zéi,释为“乌鰐,同乌贼”。第12版首次收入香港地名“鰐鱼涌”,这个“鰐”是否也读 zéi 呢?为落实该字读音,第12版修订者做了多次调研求证,证实“鰐鱼涌”的“鰐鱼”并非乌贼(乌鰐),而是鲫鱼。此地过去有一条小溪,溪中有很多鲫鱼,香港别称“鰐鱼”,“鰐鱼涌”由此得名。粤语中“鰐”的口语读音(白读)与“鰐”读音相同,与普通话中的 zé 相对应。因此,12版为“鰐”字增补了 zé 的地名读音<sup>[11]</sup>。

### ③异形词规范

异形词的规范有《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但在这个表之外,还有不少未作规范的异形词存在。为使词形选择尽量符合当代的实际使用情况,《新华字典》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例如“犟嘴—强嘴”,第11版之前以“强嘴”为主词形,但近年来“犟嘴”的使用频率已高于“强嘴”,故在第12版中调换了主次,把“犟嘴”作为主词形,与《现汉》取得一致,方便了读者的使用。

又如“啰嗦—啰唆”,第11版之前以“啰唆”为主词形,但从主流媒体查到的结果是“啰嗦”的使用频率明显多于“啰唆”,故第12版对字典用到“啰唆”的词形统一调改成“啰嗦”,以引导词形形成新的规范。

### 3. 刚性与柔性相结合

规范标准有刚性和柔性之分,在贯彻时,如何把握分寸,需要编纂者的智慧。在这方面,《新华字典》不断尝试,逐步完善。前面讲到的对异体字的处理就是很好的例子。又如《检字表》的编制,编纂者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进行完善。为方便读者查找,《新华字典》的“部首检字表”一直采用“多开门”的方式,即据形归部和据义归部相结合,将一个字归入可能归属的不同部首中。第11版修订时,《归部规范》已发布,字典仍坚持采用“多开门”的方式,但又有创新。具体做法是:在传统非规定部首的右上角加小圆圈标志。例如:“意”“志”“思”“念”“忌”“悲”按据形归部、先上后下取部的规则,分别归入规定的“音”“土”“田”“人”“己”“非”各部;同时也按传统习用的归部方式,归入非规定部首“心”部之下,用右上角加标小圆圈的方式跟规定部首相区别,这几个字在心部之下显示为“意<sup>○</sup>”“志<sup>○</sup>”“思<sup>○</sup>”“念<sup>○</sup>”“忌<sup>○</sup>”“悲<sup>○</sup>”。《新华字典》的这种做法,既体现了规范,又不拘泥于规范,一切从读者需要出发,可

谓别具匠心。

### 参考文献:

- [1] 魏至. 关于《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的修订情况[J]. 辞书研究, 1999(5).
- [2] 刘庆隆. 叶圣陶先生和《新华字典》[J]. 语文建设, 2000(11).
- [3] 杨丽娟. 《新华字典》初版记[N]. 北京日报, 2016-11-15(7).
- [4] 金欣欣, 陈悦. 《新华字典》的国际影响[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1(6).
- [5] 《新华字典》发行5.67亿本 获得两次吉尼斯纪录[EB/OL]. (2016-04-14) [2022-06-18] [http://news.youth.cn/gj/201604/t20160414\\_7858114.htm](http://news.youth.cn/gj/201604/t20160414_7858114.htm).
- [6] 晁继周. 简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语文词典论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7] 程荣. 语文辞书修订工作的基本特点——从《新华字典》的多次修订想到的[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3).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维护精品, 严谨修订[A]//《新华字典》第10版出版座谈会资料. 2003-12-28.
- [9] 程荣. 《新华字典》部首法研究[J]. 中国语文, 2019(6).
- [10] 金欣欣, 陈悦. 《新华字典》编纂修订六十年[J]. 中州大学学报, 2011(3).
- [11] 麦耘. “鲋鱼涌”的“鲋”字音读[J]. 辞书研究, 2015(6).

## Implementation and Guidance of Authoritative Dictionaries for Language Standards: A Case Study of *Xinhua Dictionary*

ZHANG Shuyan

(Research Office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Phonetic Alphabet,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The dictionary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standardized Chinese dictiona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anguage standards. *Xinhua Dictionary* has had the largest circulation and the most extensive influenc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nhua Dictionary* and language standards is reflected in “implementing standards” and “guiding standards”. Its imple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standards are in an all-round way,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haracter's pattern, pronunciation, order and retrieval, and amount. Its guidance for the standards is reflected in finding the deficiency of standards, making flexible treatment, and becoming the re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of standards, or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s directly.

**Key words:** dictionary; *Xinhua Dictionary*; language standard

(责任编辑 雪 箫)